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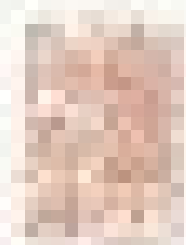


主編 申維辰

山西文學大系

【第七卷】現代文學（中）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文學大系

主编 申维辰

本卷编选 苏春生 杜学文 师振亚 审稿 董大中

山西文学大系

【第七卷】现代文学（中）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西文学大系·第七卷, 现代文学·中/申维辰主编; 苏春生, 杜学文, 师振亚编选.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03-05191-9

I. 山... II. ①申...②苏...③杜...④师...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山西省-现代 IV. I21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552 号

山西文学大系·第七卷

——现代文学 (中)

主 编: 申维辰	E-mail: Fxzx@sxskcb.com (发行中心)
编 选: 苏春生 杜学文 师振亚	Web@sxskcb.com (信息室)
责任编辑: 蒙莉莉 武 静	Renmshb@sxskcb.com (综合办)
责任校对: 郭永慷	网 址: www.sxskcb.com
装帧设计: 冀建海	经 销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印制: 赵宏生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责任发行: 赵并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印 张: 27.75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字 数: 483 千字
邮 编: 030012	印 数: 1-3 000 册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0351-4922208 (综合办)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山西文学大系》编委会

顾主	问编	姚申	莫维	中辰	马 烽		
副主	编定	薛俊	杨 义	申维	董国炎	苏春生	杜学文
策审	划务	申维	杜学文	薛俊	薛俊		
执行	编委	杜学文	申维	卢 渝	苏春生	白小平	
编		张继	张继	苏春生	段崇	张彦彬	
		郭贵	郭贵	崔元	崔元	姚乃文	
		董国	董国	韩玉	韩玉	董大中	
		薛俊	薛俊			逆哲	

(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西文学大系》工作室

总 监	卢 渝	崔元和	
副 总 监	张彦彬	张继红	
工作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小平	杨 文	张文颖
	李慧智	武 静	赵并林
	赵宏生	秦继华	莫晓东
	高美然	郭永慷	阎卫斌
	傅晓红	蒙 莉	薛 飞
	冀建海		

目 录

抗日战争前期山西文学概论	[1]
李公朴	[18]
华北敌后——晋察冀 (节选)	[19]
丁 玲	[32]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节选)	[33]
沙 汀	[54]
随军散记 (节选)	[55]
吴伯箫	[66]
潞安城	[66]
吴奚如	[70]
汾河上 (节选)	[71]

2 山西文学大系·现代文学(中)

周立波	[97]
黄河	[97]
沁源人民	[100]
范长江	[106]
吊大同	[106]
罗 烽	[112]
莫云与韩尔谟少尉(节选)	[112]
艾 青	[128]
风陵渡	[128]
怀临汾	[130]
卞之琳	[132]
放哨的儿童	[132]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节选)	[134]
公 木	[146]
岢岚谣	[146]
蒋 弼	[160]
我要做公民	[160]
李伯钊	[165]
母亲	[165]
萧 红	[189]
黄河	[189]
孩子的讲演	[197]

叶以群	[203]
渡漳河	[203]
白 朗	[210]
中条山上的小战士	[210]
端木蕻良	[216]
风陵渡	[216]
何其芳	[229]
《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一）	[229]
力 群	[240]
野姑娘的故事	[240]
天 蓝	[253]
队长骑马去了	[253]
陈荒煤	[261]
陈赓将军印象记	[261]
方 殷	[268]
黄河上的老舵手	[268]
杨 朔	[272]
昨日的临汾	[272]
于黑丁	[277]
野祭	[277]
贾植芳	[285]
我乡	[285]

4 山西文学大系·现代文学(中)

姚青苗	[294]
马泊头	[294]
刘白羽	[304]
黄河上	[304]
柳 青	[313]
牺牲者	[313]
田 间	[323]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324]
赶车传(节选)	[324]
黄 钢	[331]
我看见了八路军	[332]
商展思	[352]
游击队里的小鬼	[352]
穗 青	[354]
脱缰的马	[355]
康 濯	[398]
风暴代县城	[398]
王博习	[405]
拦牛人的故事	[405]
牛 汉	[408]
鄂尔多斯草原	[408]
山野的气息	[420]

贺敬之	[422]
过黄河	[422]
临南民兵	[424]
民 歌	[428]
抗日全凭共产党	[429]
送郎参军打日本	[429]
平型关上逞英雄	[429]
杀汉奸	[430]
鬼子毒狠赛虎凶	[430]
打走敌人变活城	[431]
民谣二首	[432]
万里长城万里长	[433]
欢迎八路军进城	[433]
八路就是炼铁汉	[434]
团结起来把家保	[435]
关高不遮抗日路	[435]
“优抗”工作要诚心	[436]
柳树开花一团金	[437]

抗日战争前期山西文学概论

一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保家卫国，同野蛮残暴的日军进行的一场伟大而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七七事变后，太原于1937年11月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开赴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山西抗日军民经过1939年一年的反围攻、反“扫荡”、反顽作战，粉碎了敌、顽夹击，晋察冀、晋冀豫、晋绥三大边区基本上结束了抗战初期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完全控制了晋绥之晋西北，晋察冀之北岳、冀中，晋冀豫之太行、太岳、冀南等广大地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团体和文艺领导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领导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1938年4月，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协会（简称“文协”）成立，1939年2月15日改名为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边区文救会”），选举叶正莹、邵子南、周明、陶宗侃（罗东）、鲁萍、白冠亭、张维、邱溪映、谷荣章、邓拓、李宗美等11人为执行委员，叶正莹、邵子南、李宗美、周明、

陶宗侃为常委。以后,执委会推举刘平为主任(兼任《抗敌报》副总编),叶正莹为副主任,并建立常设机构,决定出版综合性刊物《边区文化》。在边区文教会的领导下,各专门协会相继成立。1939年7月7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简称“剧协分会”)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称:“晋察冀边区的戏剧运动,在粉碎敌人屡次的进攻,巩固与扩大边区的过程中,是起了应有的作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号召“全边区的全国戏剧工作团体与戏剧工作者们,在抗战的战线上,握紧我们的武器,守住我们的岗位。工作呵!战斗呵!”^[1]会议推举抗敌剧社、西战团和战线剧社各派一名代表建立常设机构,选罗东为主任。1940年7月2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简称“文协分会”)正式成立。到会代表共50余人,成仿吾、沙可夫分别作报告,会议通过提案31条,主要项目有建立文学顾问委员会、鲁迅研究会、文艺流通图书馆,设立鲁迅文学奖等,决定每年评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奖,并成立编审委员会,出版各种文艺刊物、丛书。会议选举成仿吾、邓拓、丘岗、沙可夫、田间、肖无、周而复、邵子南、刘平、韦明、魏巍、罗立斌、王林、叶正莹、何洛、何干之、康濯等为执行委员,选举沙可夫、田间、魏巍、何洛、康濯等5人为常委。会议还就边区的文艺现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

1941年6月16日,晋察冀边区文化界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取代边区文教会。到会代表32人,推举成仿吾、常青、沙可夫、何干之、周巍峙、邓拓等15人为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创作活动、文艺批评、乡村艺术活动、出版工作、文艺工作者学习理论和深入实际问题。大会选举成仿吾、沙可夫、常青、邓拓、何干之、潘自力、周巍峙、叶正莹、史立德、王林、罗东、田间、沃渣、丁里、卢肃、金肇野、陈山、黄天、张春桥、崔嵬、杨朔、雷烨、梁斌等为执行委员,孙犁、周而复、冯宿海、赵化风、汪洋为候补执委,并推举沙可夫、罗东、周巍峙、史立德、叶正莹、金肇野、沃渣、田间为常务委员,沙可夫为主任。从此,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8月晋冀豫边区基本形成。是年秋天,成立了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岳区党委。因晋冀豫边区是以太行山为依托,晋东南又为边区的腹地地带,所以文化领导机构多建于晋东南,名称上也有“晋冀豫”、“晋东南”、“太行山”等互用的情况。实际上都是整个边区的领导组织。晋冀豫边区的文艺领导机构是先筹建各专门文艺协会,后才成立总领导机构的。1939年1

月4日,边区戏剧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的筹委会,推举朱光、陈沂、赵品三、李伯钊、张柏园及太行山剧团、大众剧团、火星剧团、决死一、三纵队剧团,联盟上党中心区抗日剧团11席为常委。朱德和薄一波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工作,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简称“剧协分会”)于2月28日在长治成立。参加会议的有边区67个大剧团的代表60余人,选举太行山剧团等13个单位为执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简称“文协分会”)于1939年11月28日在武乡下北漳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40余人。会议选举李伯钊、何云、孙泱、刘白羽、王玉堂(冈夫)、荒煤、蒋弼、张香山、洪荒、袁勃等14人为理事,李伯钊、蒋弼、孙泱、王玉堂、洪荒为常务理事,并分别在太南、太岳、太北、冀西等区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和出版文艺刊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是全国文协成立后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分会组织。

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简称“文教总会”)经过4个月的筹备工作,于1939年5月4日在沁县南河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包括边区文化、教育界各党派团体及敌占区的名人文士。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文教总会的宣言、简章、工作纲领等。大会选举高沐鸿、史纪言、王振华、李棣华、崔斗辰、李伯钊及团体会员新华日报社(华北版)、民族革命通讯社(简称“民革社”)、胜利报社、剧协分会、青记分会等23席为执行委员,推举马君图、薄一波、戎子和、杨献珍、刘济荪、李墨卿、吴松涛为名誉委员。王振华、史纪言、王玉堂、高沐鸿及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为总会常委。大会制定了工作任务:一、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坚定持久抗战与增强保卫晋东南抗战必胜的信心;二、创造、提高与发展抗日的、民族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三、广泛开展宣传战,粉碎敌伪欺骗宣传;四、协助政府协同其他宣传教育出版机关,组织宣传出版委员会,推动、统一并巩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五、推动并协助各文化团体开展并充实工作;六、团结各地文化教育工作者,组织各地文化教育救国会(简称“文教会”);七、普及社会教育,扫除文盲,建立学校教育,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八、展开敌占区的宣传教育工作与争取敌伪军的工作。晋东南文教总会于1940年10月19日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杨秀峰、徐懋庸、任白戈、李伯钊、朱光、刘岱峰、高沐鸿、杜润生、安岗、刘稚灵、郝汀、王振华、王韦、林韦、崔玉庭、史纪言、陈默君、吴敦涛等为执委。并于第二届执委会议召开时,决定将晋东南文化教育抗日救国总会改称晋东南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

联”)。1941年7月,晋冀豫和冀鲁豫两块抗日根据地合并,成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原设在晋东南的晋冀豫边区文化联合机构相应改称晋冀鲁豫边区的文化联合机构,与此相应,原晋东南文联也称“太行文联”或“晋冀鲁豫文联”。

晋绥边区的文艺工作主要由边区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领导。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北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晋西北、晋西南两区合并组成中共晋西区党委,同时成立以贺龙、关向应为正、副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绥各项工作。因此,晋绥也曾称为“晋西”或“晋西北”。晋西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简称“晋西文联”)的筹备工作主要由亚马、卢梦、伍陵3人组成党支部负责。1940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由张稼夫、赵林、杜心源、常芝青等人组成的晋西文联筹备委员会,接着,从延安来的陶剑心、石夫、赵力克、余蔚中、李清宇等参加了筹备工作。同时邀请曾为太原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成员的刘仰峤、廖井丹、樊希騫前来工作。1940年5月4日,晋西文化教育界抗日联合会在兴县城关正式成立。边区党政军领导贺龙、关向应、续范亭、林枫、南汉宸、甘泗淇、张稼夫等出席大会。会上,贺龙作了《抗战形势与根据地建设》的报告;关向应作了《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甘泗淇作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的报告;南汉宸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萧三、延安鲁艺代表胡考、新华社代表郁文也分别作了报告。大会就文艺、戏剧、新闻、教育等工作进行了座谈。大会选出以贺龙为首的理事会,亚马当选为文联主席。文联负责人还有卢梦、伍陵。并决议分别成立各协会分会,其中,剧协负责人为伍陵、林杉,文协负责人为卢梦(兼),成员有张非垢、莫耶、田家等。

晋绥文联成立后,将晋西南和晋西北的文艺工作做了统一调整、安排和整顿,使得晋绥边区文艺运动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晋冀豫边区及山东等地的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了整个根据地文艺的蓬勃发展。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在建立抗日救亡的文艺领导组织的同时,先后创办了大量的报刊,促进了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如晋察冀边区主要有《边区文化》、《海燕》、《联大文艺》、《文艺工作》、《战地文艺》、《抗敌报》副刊、《诗建设》、《边区诗歌》等,晋冀豫边区主要有《文化哨》、《文艺轻骑》、《新华日报》副刊《新地》、《新华文艺》、《黄河日报》副刊《燎原》、《山地》以及八路军总部的《战斗文艺》等,晋绥边区主要有《抗

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五日时事》、《晋西大众报》、《文化导报》、《战斗文艺》、《战动周刊》、《牺牲救国》、《先锋半月刊》等。

抗战初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就文艺理论问题和一些文艺现象展开了讨论。

早在1936年太原沦陷以前,山西文学界曾就“国防文学”作过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当时在上海有两个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山西处于华北抗日前线,所以着重宣传“国防文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以“国防”为主题的作品,1936年12月赵树理写的《打倒汉奸》就是一例。

本时期的文艺论争,首先是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和大后方重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关注。尤其是太行根据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刘焚发表《谈谈文艺的民族形式》,批评向林冰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载1940年3月24日重庆《大公报》)。他认为,敌后活生生的新的现实,应该产生出一种活生生的新的文艺。这种新文艺,在内容方面是最富于现实性的,在形式方面也是最能表现今天敌后的高度紧张热烈的战斗现实的。它应该是从民族的旧形式、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去摄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同时,主要的要求作者从伟大的现实当中吸取其创作的源泉。一切旧形式的利用,只能是为了最生动、最恰当地表现现实,只应该是摄取其精华,只应该是为了打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绝不是机械地照抄一遍,把新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硬往旧形式里套。^[2]刘备耕发表《民族形式,现实生活》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对旧形式的改造问题,他指出:“旧形式不加以必要的适当的改造,不吸收新的滋养料,就不可能表现现实,更不可能成为民族的形式。”^[3]张秀中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主体”》一文,批评刘备耕把“旧形式是不是民族的形式”与“旧形式如何才能成为民族形式”混为一谈。他认为今天的“新形式”应该就是民族的新形式,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民族形式不能像刘备耕所说的是大众所熟悉的形式,而应该是民族形式可以代替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新形式’即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今天创造民族形式就应以它为主,继承它的光荣传统,并发扬光大之”^[4]。此外,徐懋庸、任白戈、蒋弼等人也都发表文章,阐明各自的观点,使讨论进一步深入,问题更趋于清晰。

其次,是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过三次讨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就此也开展了讨论。尤其是在太行区,讨论尤为热烈。讨论是由“通俗化研究会”发起。当时有两种意见:有一部分人认为新文艺应该以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的成功作品为标本,强调语言的科学化、文体的现代化,对明清以来的通俗章回小说重视不够,瞧不起普通的群众性的文艺,认为太土气。另有少数人,以赵树理、王春等人为代表,力主文艺应该通俗化、群众化、大众化,积极拥护鲁迅关于大众化的主张,认为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不够通俗化、大众化。据此,赵树理、王春、林火等人组织了“通俗化研究会”,参加的人员还有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章容等人。他们以《抗战生活》为阵地展开讨论。他们在《抗战生活》革新号二卷一期上发表署名“吉提”(“集体”谐音)的《通俗化“引论”》的文章,文中指出:通俗化“不仅仅是抗战动员的宣传手段”,“它还得负起‘提高大众’的任务”,“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通俗化的任务在于‘普及文化’,‘提高大众’”。文章批评了把“通俗化”与“通俗文艺”混为一谈的错误。他们在《抗战生活》革新号二卷二期发表《通俗化与“拖住”》,署名“陶伦惠”(“讨论会”的谐音)。文章把“提高大众”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改造大众迷信落后思想,使大众都能接受新的宇宙观;第二是灌输大众以真正的科学知识,扫清流行在大众中间的一些对事物的错误认识;第三,在文字方面,也应该使大众逐渐能够欣赏新的形式,而不尽局限在旧的鼓词小调上头;第四是应该注意到大众语言的选择采用,逐渐克服大众语言的缺点,更进一步丰富大众的语言。”并以这四条标准对当时一些“通俗文艺”给予批评,指出它们“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是绝对的要不得的”。后来,晋绥边区文联的亚马和卢梦也发表文章提倡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整个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了工农兵文学高潮。

二

抗战初期,山西文学创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作品之多,为山西文学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出现这种形势的原因,首先是时代的要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

心，全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投身于这场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人们渴望得到文学的鼓舞与激励，从中获取无尽的力量。其次，山西当时处在全国抗战的前线，斗争异常尖锐和残酷，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都以山西为基地，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的部分军队也在山西部分地区浴血奋战。狼烟滚滚，战声震天，血与火、生与死、爱与恨，交织成一曲曲动人的乐章，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而动人的素材，也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第三，随着山西抗战斗争的开展，全国许多著名作家来到山西，如来自延安的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团长王锡礼、副团长宋之的带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等，还有萧三、李公朴、刘白羽、周立波、范长江、陈荒煤、卞之琳、沙汀、何其芳、吴伯箫、萧军、萧红、黄钢、舒群、艾青、康濯、碧野等，都来到山西访问或工作。这实在称得上一向闭塞落后的山西的一次大开放。这么多名作家的到来，为山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他们用先进的文化成果、高超的艺术技巧、热情的工作精神浇灌了我们这块可爱而贫瘠的土地，推动了山西文学事业的发展。由于上述原因，抗战前期，山西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诗歌创作

在全民抗日救亡的艰难时刻，诗歌作为时代的号角，以嘹亮的声音响彻山西大地。“街头诗”就是与全民抗战热潮同时兴起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诗歌创作运动。“街头诗”运动首先起于延安，接着，由从延安出发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将她带到山西，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逐步展开。“街头诗”也叫传单诗、墙头诗，形式短小，易懂易记，主题鲜明，战斗性强。正如袁勃所说：“‘街头诗’写在了农村的墙头，传单诗散布在集会的人群，这些诗，在各个战斗场合里，显示出了一种目的：‘当冲锋号未吹起时，它就要准备冲锋，号召冲锋；当肉搏快开始时，它就要准备肉搏，号召肉搏；并直接参加在战斗的过程中。’”“街头诗”是诗人们“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口，把自己写出来的诗歌，直接地、迅速地写在街头，写在庙宇的墙壁上，写在多数人通过的大道旁边，在大会上朗诵……成为诗歌工作者最新最快发表自己诗歌的方法。”^[5]

1938年初，诗人田间在山西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下了不少“街头诗”。田间1938年初春到山西，不久，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为战地记者。夏初到延安，同柯仲平等发起“街头诗”运动。田间于1938年秋离开延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经岚县到晋察冀边区，与邵子南、史轮、曼晴等人创作并